

第一章

全球化中的区域发展



学习目标

- [1] 了解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 [2] 掌握全球治理的核心思想。
- [3] 了解世界区域发展的主要特征。



能力目标

从相互依赖视角分析全球化中的区域发展特点。



思政目标

- [1] 树立开放、自主、积极、合作与发展的区域治理观和知识体系。
- [2]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实践中,思考、探索并构建区域治理的中国范式。

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历史进程进入一个迅速变革的新时期。新兴市场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正在重塑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版图;国家间和区域间的相互联系也在增强。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持续攀升,产业科技变革速度加快,发展道路也呈现多样性。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全球化浪潮更助推了资源、要素、信息和知识的全球流动,促进了国家、地区间的经贸往来;彼此间在社会、文化、政策、制度和思想的接触意愿与能力也在增强。但是,由于发展目标、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发展能力在国家、地区间仍存在差异,因此全球化不是一个均质的、同节奏的进程。全球化中的区域化特征逐步显现。

第一节 全球化中的相互依赖

一、相互依赖思想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y)的思想源远流长。中国哲学博大精深,每一种思想流派和每一方智慧良田,都蕴含着广泛而深刻的相互依赖的思想。相互依赖既是自然万物共生的法则,也是人类社会和谐进步的内在规律。《道德经》中已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哲学思想。这里所指的宇宙是一切存在之全,是“至大无外”;每个人、每个事物都应当被看作宇宙的一部分。^①正是这种天地一体和万物一体才使它们彼此间相互转化,没有绝对界限。同时,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哲学也是在首先定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础上才构建社会意义和国家意义上的发展逻辑。

西方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源于交换和劳动分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之《分工的根源》一章中提出“通过契约、以物易物和购买来获取大部分我们所需要的相互的帮助和照料,正是这个以物易物的意向最初引起了劳动的分工”。^②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并产生互动是出于生存和活动需要,因此人的利益具有相互相关性。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Dewey)认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相关性是适应环境的一种行为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建构出来的意义网络是社会经验。^③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企业和贸易作为经济生活的最主要形态时,分工也逐渐从个体间转向企业间、地区间和国家间。这一过程推动了国际分工、塑造了全球市场、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在当代国际问题领域,“相互依赖”这一概念始于20世纪60年代。从广义上讲,相互依赖是“一个人的条件依赖于另一个人,反之亦然”。^④相互依赖的行为与效果在政治、经济、技术、安全、社会、文化中广泛存在。它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

①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② 斯密. 国富论: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M]. 谢祖钧, 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

③ DEWEY J. Human nature and human conduct[M].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2.

④ NYE J S JR, WELCH D A. Understanding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M]. 10th ed.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原文为“Interdependence is where the condition of one depends on another and vice versa”。

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景。^① 美国学者罗伯特·O. 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S. 奈(Joseph S. Nye, Jr.)认为,全球主义是世界的一种状态,是世界洲际存在的相互依赖网络,并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民、军队、与环境生物相关的物质(如酸雨和病原体)的流动和影响在一起。全球化或去全球化指的是全球主义的增减。^② 在全球主义框架内,经济全球主义、军事全球主义、环境全球主义、社会文化全球主义构成了四个主要维度。他们以权力与相互依赖作为分析框架,采用“敏感性”和“脆弱性”解构了国家间复合相互依赖、均等依赖、绝对依赖和不对称依赖情景。也有观点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导致其他国家或国际关系敏感性(sensitivity)的增强。^③

二、经济、技术、社会全球化中的相互依赖

相互依赖是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表现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广泛关联性,以及通过合作来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特点。相互依赖并不等同于全球化。全球化是一种多边网络化关系,也是一种包含洲际距离的全球主义,而非两个主体间的单一的相互依赖关系或区域网络。

(一) 经济全球化中的相互依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1997)》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加强”。在全球化的流动空间中,经济与文化地理以更加复杂的世界网络形态进行演化。通过空间相互依赖来概括当代变化世界中的流动和迁移具有可行性。^④ 20世纪60年代,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关注到了全球化分工中的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一类商品的连续生产过程被分割成一条垂直的贸易链,由每个国家根据其比较优势对生产过程中的各阶段分别将其附加值化。”^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要素和资本流动下国家

① KEOHANE R O, NYE J S.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M]. 3rd ed.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② 基欧汉, 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M]. 门洪华, 译. 4 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③ COOPER 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④ CASTELLS M.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⑤ BALASSA B. Trade liberalization among industrial countries[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7.



和地区间在资源、技术、产品和服务上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进入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和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跨国企业作为主要节点,彼此间关系更为绵密,分工更加深化,形成了相互依赖型的国际经济体系。同时,经济的相互依赖加深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利益连接,提升了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嵌入性(embeddedness)。在动态变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家和地区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产生循环累积效应(effect of cumulative causation),这对国际政治关系的演变也起到了较大作用。

(二) 技术全球化中的相互依赖

技术全球化是知识流动、专利流动和技术转移在全球化中的表现。通过国际产业分工、对外投资和贸易而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技术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①②} 技术全球化不仅重构了世界科技版图,对推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化过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技术创新主体之间在地理空间,或者心理、文化和社会因素上的毗邻性(proximity)也将影响彼此间的互动与沟通,从而影响相互依赖的程度。^③ 如在2006年至2016年,国际合作发表的科学和工程出版物的比例从16.7%上升到21.7%。^④ 技术全球化的表现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世界范围内对技术的公共投资和商业投资成为普遍共识和普遍行动;二是国家、地区间的科技联系普遍增强,体现在专利流动、知识产权贸易、科技人才跨国、跨区域流动上;三是对技能的投资以及对劳动力市场匹配程度的改进促使国家、地区间有更多的区域中心产生,且相互间技术联系的绵密性也在加强。

(三) 社会全球化中的相互依赖

人口的空间迁移是人口跨越领土边界或者行政区域边界,从一个区域迁移到

① FREEMAN R B. Global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talent: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students, workers, and ideas and the world economy economy[J].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2010, 19(5-6): 393-406.

② NIOSI J, BELLON B. The global interdependence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evidence, limits, and implications[J]. Technology in society, 1994, 16(2): 173-197.

③ BOSCHMA R A. Proximity and innovat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J]. Regional studies, 2005, 39(1): 61-74.

④ National Science Boar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8[R]. Arlington, VA: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2018.

另一个区域的过程。人口迁移的原因各不相同,如逃离冲突和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寻求更好的环境和教育条件等。劳动力迁移是人口迁移的一种主要形式,是由于人们需要为生产活动提供劳动力(如体力、脑力、智力等)而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联合国(UN)估计全球移徙人口为 2.58 亿,其中 1 940 万人在非洲内部移徙^①,而 4.8 亿欧盟(EU)公民在欧洲大陆各成员国之间流动、居住、学习和工作^②。在欧洲的自由移民制度历史化中,工人的自由流动是 1957 年欧洲经济共同体谈判的核心。^③

移民、社会融合与全球化也形成了相互塑造的社会全球化过程,且具有相互依赖的特征。虽然难以清晰划分孰因孰果,但是毋庸置疑:全球化进程中的移民数量和文化与社会制度等的交流确实显著增长了。从全世界范围内看,移民的基础是全球人口的增加,其动机或许是对工作机会、生活条件和安全环境的更多愿望。通过移民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以及全球福利改善,也是社会全球化的重要结果。根据联合国统计,2019 年世界移民人数达到 2.72 亿,比 2010 年增加了 5 100 万,移民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为 3.5%,这一数字包括近 2 600 万难民以及一定比例的女性(48%)和 3 800 万儿童,工作年龄在 20~64 岁之间的比例为 31%。31%的移民在亚洲,30%在欧洲,其余的在美洲(26%)、非洲(10%)和大洋洲(3%)。^④ 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尤其是技术和人才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增加相当于其总劳动力数量 3%的技术和非技术劳动力暂时性劳动力流动配额,估计每年将为全球带来超过 1 500 亿美元的福利增加。^⑤

社会全球化的推进得益于交通基础设施与信息通信手段的广泛使用。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GPCI)采用了一项评估城市竞争力的指标——可达性(accessibility)。其中,交通可达性以更加多样和更强性能的多样性交通基础设施存量作为评估指标。交通可达性意味着交通基础设施提高与扩大了全球人口和物质资源的流动

①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R]. New York, 2017.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Maximising the development impact of migration [M].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2013.

③ COMTE E. European regionalism and migration global governance[J]. Les cahiers irice, 2012, 9(1): 117-137.

④ AL-HAYANI B, ILHAN H. Efficient cooperative image transmission in one-way multi-hop sensor network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education, 2020, 57(4): 321-339.

⑤ WINTERS L A. 模式 4: 贸易自由化对经济的影响[M]//MATTOO A, CARZANIGA A. 人才流动与服务贸易自由化.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42.



速度和空间范围。信息可达性是指信息通信技术广泛在经济社会领域应用；这一进程加速了网络空间上的全球化进程。网络空间的全球化突破了地理空间的局限,加速了世界范围内信息流动,促进了人类社会在知识、经验、文化、观念上的交流碰撞。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化的参与机制,且将在更长时间跨度上影响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第二节 全球治理

一、全球化挑战

经济全球化存在不平衡性以及国际政治结构改革停滞,也加深了国家、地区内部的不平等、贫困、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意识等领域,甚至出现了很强的极化效应。发达国家(地区)在全球治理体系、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上仍掌握主导权,而欠发达国家(地区)和落后国家(地区)尚无法完全分享全球化成果,停留于低端路径锁定状态。

(一)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非均衡性

虽然全球化在很多领域得以呈现,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化并非发生在所有领域和所有地区。经济全球化出现了“局部性”,存在“低端锁定”(lock-in)。传统发达国家通过重大基础科学发现与国际技术转移,获得了经济增长的新动力。^①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却无法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广泛参与和深度参与的目标,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在低附加值位置,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受到了深度抑制。经济全球化并未呈现出均质连续分布的区域格局。人口总量、经济总量、全球贸易、技术专利、基础设施可达性上都呈现出非均衡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2018)报告指出:全球基础设施的可达性在国家间并不均衡,很多欠发达国家的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甚至还未达到满足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

从人口和经济总量角度看,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口总量最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欧洲与中亚地区和南亚地区人口总数相近。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和

^① GATES D M. Basic research in Europe-reply[J]. Science,1959,130(3368): 171.

中东与北非地区人口总数分别位列第五和第六。北美地区人口总数最少,如图 1-1 所示。从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来看,北美地区的人均 GDP 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欧洲与中亚地区次之,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和中东与北非地区人均 GDP 相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地区人均 GDP 最低,如图 1-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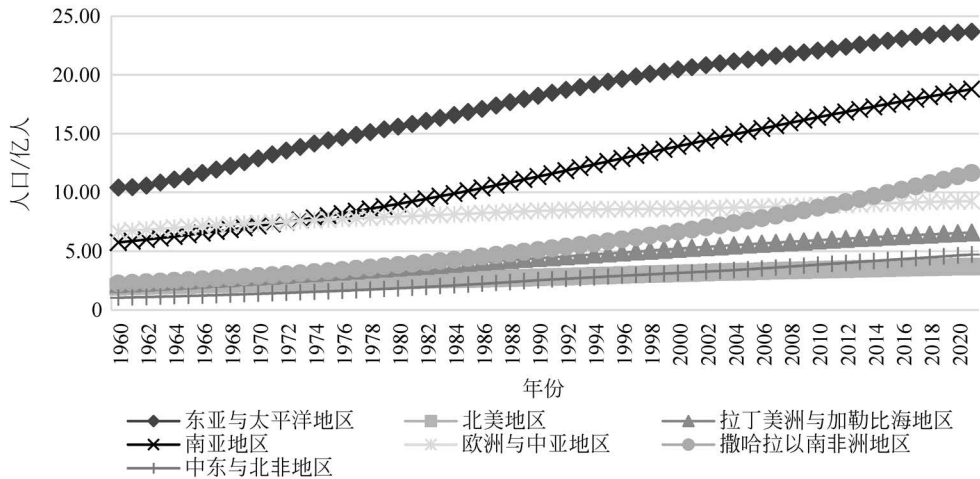


图 1-1 全球各地区人口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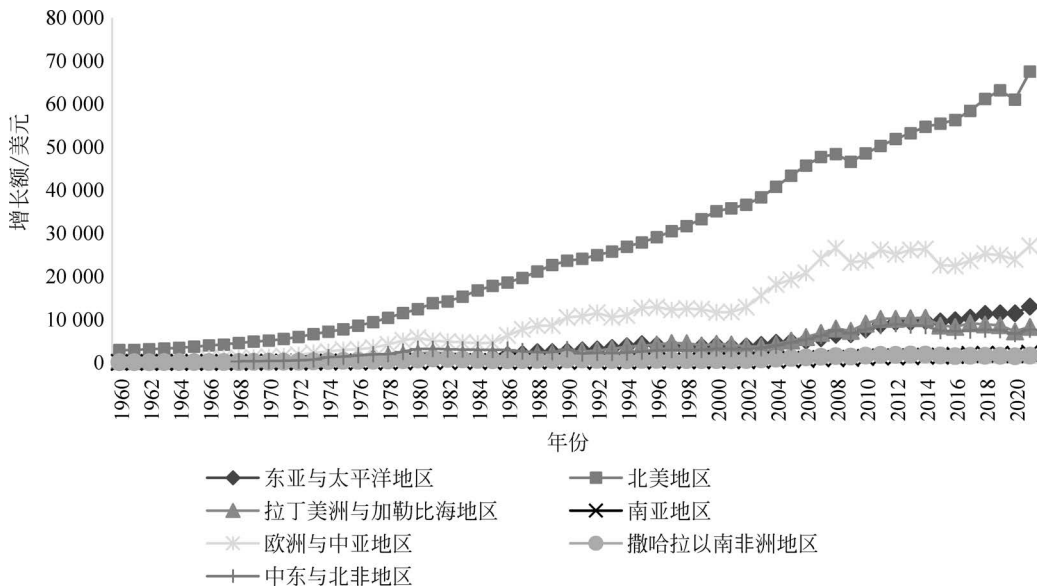


图 1-2 世界各大区人均 GDP 增长情况(现价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从进出口贸易指标看,欧洲与中亚地区商品进出口贸易额在各大区域中居首位,东亚与太平洋地区次之,北美地区和欧洲与中亚地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贸易额相差较大,位居第三。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和中东与北非地区商品进出口贸易额相差不大,位列第四和第五。南亚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商品进出口贸易额最低,如图 1-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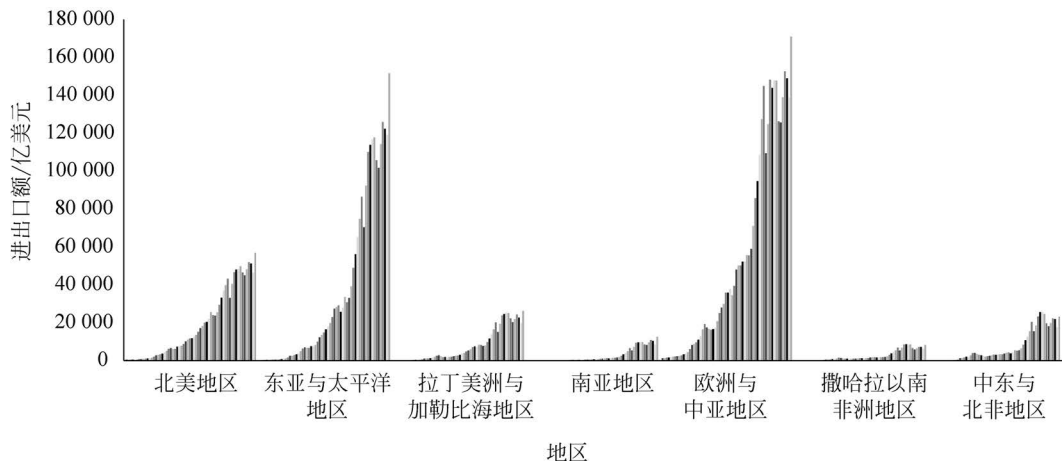


图 1-3 1960—2021 年全球各地区进出口额 (现价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结构改革步调不一

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是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政治体系改革没有形成动态适应。全球范围内的权力分散且出现非对称性。^① 联合国、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机构尽管被认为具有广泛的权威性,但是在一些关键性的全球问题的处置机制上仍有失灵问题,在协调各国利益时无法发挥机制性作用。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持续低于全球 GDP 增速,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也一直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最好水平。^②

全球孤立主义、分离主义、民族主义交织,对国际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外溢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传统的国际关系结构仍在根深蒂固地影响着西方国家的发展逻辑。在国际政治场域中,它们不仅希望仍能掌握全球治理的主导权,也正在采用各种方式来维持这种旧有的国际政治结构。基辛格(Kissinger)认

① 张宇燕,李增刚. 国际经济政治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② 全球贸易占 GDP 比重数据:2008 年占比为 51.44%;2016 占比为 42.66%;2018 占比为 46.14%。

为国际秩序的巩固与发展依赖成功的全球化,然而全球化的进程也会引发逆全球化的政治反应。^①对全球化结果的误判将给自身带来冲击,导致当今一些国家重拾孤立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现象频繁发生。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大国与小国在世界体系中的权力是不均衡的。大国影响全球政治和经济走向,小国只能被动接受。然而,这种观念带有明显的歧视性,不利于世界各国普遍而广泛地享受经济全球化的成果,甚至可能还会引发逆全球化的反应。只有在全球化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才能有效地推动国际政治结构向更加包容、健康、平衡的方向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广泛的全球化,让世界各国分享全球化带来的成果,实现世界的协调和包容发展。中国是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中国正在努力建构全球治理新局面中的新型大国特征。2022年6月17日晚,习近平主席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二十五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习近平主席强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并支持各国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促进全球平衡、协调、包容发展。

二、全球治理理论

(一) 全球治理理念的提出

全球治理的理念源起于20世纪70年代。基欧汉和奈将全球化描述为一个“复杂性的独立”时期,认为全球治理存在必要性,在这样一个“复杂性的独立”时期,需要国际制度和其他国际组织作出应对。^②由于现代社会复杂性加剧、人口流动加大,以国家为单一主体来参与全球治理存在不足;而构建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全球化治理尤为必要。^③

全球治理是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一套体系。^④全球治理中蕴含的全球合作模

① KISSINGER H. World order[M]. New York: Penguin Books,2014.

② KEOHANE R O, NYE J S.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M].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1977.

③ ROSENAU J N, SINGH J P.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global politics: the changing scope of power and governance[M]. Albany, NY: SUNY Press,2002.

④ 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 20-32.



式反映了国际合作的新特征和新问题。^① 全球治理是个人与机构,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管理共同事务的多种方式的集合。它可以促进存在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的各方主体调和争议并采取联合行动,既包括通过拥有治理权力的制度化机构的治理行为,也包括相关治理参与者的非制度化的治理行动。^② 也有观点认为,全球治理为国际组织在试图不断努力达到理想和实际的目标的辩论中,取代“世界政府”的一个易让人接受的术语。^③

可见,全球治理是为应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涉及和平、安全、发展等各个领域的问题,而建立的一套规则与程序。全球治理对象包括全球治理行为所指向的客体,也就是那些正在影响或即将影响全人类的全球性问题。^④ 治理对象包括全球安全(如防止武装冲突、核武器的生产与扩散,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与扩散)、国际经济(如全球经济安全、公平竞争、世界贸易)、生态环境(如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稀有动物保护、防止臭氧衰竭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防止跨国犯罪(如走私、非法移民、国际恐怖活动)和基本人权(如防止种族灭绝、屠戮贫民以及疾病传染和饥饿)。

全球治理改革就是针对上述已经出现或潜在的全球公共议题建立新的治理规则、解决机制和有效方案。随着全球化、全球问题以及国际社会新兴力量的崛起,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的贡献不断得到体现。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2013年3月27日)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为全球各国和地区可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中国方略。

(二) 全球治理特征的应然性

1. 治理主体多样性

全球治理不等于全球政府或世界政府,也不是民族国家行为体的简单组合,而是一种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以及从地区到全球层次解决共同问题

① 蔡拓,林南林. 全球治理: 适应全球化的新的合作模式[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63-70.

② 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 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 伦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③ BARATTA J P. The politics of world federation: from world federation to global governance[M]. Westport: Praeger,2004.

④ 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 20-32.

的新方式。^① 全球治理与非政府组织(NGO)、公民运动、跨国公司和全球市场有关,同时也与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球媒体相互作用。^② 现实主义学派强调国家权力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如吉尔平(Gilpin)^③、科克伦(Cochrane)^④、达菲尔德(Duffield)^⑤。新自由主义制度学派则关注国家以外的其他主体的角色,重视不同类型主体间的合作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机制和影响。国家不应作为政策制定的唯一主体,核心参与者应该包括国际化的公共官员(工作在某个国家机构,代表国家参与全球政策讨论)、国际公民(在国际组织工作,管理相关机构的人员)以及跨国政策专家(如政策顾问、执行官、科学家、非营利组织负责人)。^⑥

全球治理主体包括超国家组织、区域性组织、跨国组织、次国家组织和主权国家。^⑦ 在国际场域中的公民、社会、市场和国家都是国际公权力的拥有者,也是全球治理的主体。^⑧ 因此,全球治理主体具有多极化,正式权力来自政府、国际组织,非正式权力来自对跨国规则和权力体系能够施加影响的组织与集团。斯科尔特(Scholte)证实了公民社会通过提高全球治理运营的公共透明度、监督和审议全球政策,为全球治理带来更多的公共责任。^⑨ 技术专家需要在专业领域发挥他们的知识和专长,并参与治理过程。^⑩ 可见,全球治理模式需要从“国家中心”向“多极化”转变,并将政策空间作为分析工具,治理参与者可以通过跨国的、多层次的协调活动,实现权利的增长。^⑪

① 星野昭吉. 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M]. 刘小林,张胜军,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0.

②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③ GILPIN R. A realist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M]//MCGREW A, HELD D, GOLDBLATT D. Governing globalization: power, autho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2002.

④ COCHRANE F, DUFFY R, SELBY J. Global governanc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⑤ DUFFIELD M R.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new wars[J].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2014, 15(3): 120-121.

⑥ STONE D. Global public policy, transnational policy communities, and their networks[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08, 36(1): 19-38.

⑦ 麦克格雷. 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M]//俞可平. 全球化: 全球治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⑧ THAKUR R, WEISS T G.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UN: an unfinished journey[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⑨ SCHOLTE J A.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cally accountable global governance[J].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04, 39(2): 211-233.

⑩ 麦克格雷, 陈家刚. 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1): 33-42.

⑪ CERNY P G. The government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Z]. 2008.



2. 治理议题跨国(地区)性

正在影响或即将影响全人类的全球治理议题具有跨国(地区)性,它们数量众多,涉及领域广泛。全球治理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某个国家(地区)或某些国家(地区)所特有,而是全球范围内多数国家(或地区)所共有,例如流行病爆发、大气污染、水污染问题等。因此,其影响范围具有跨国(地区)性。在全球化影响下,一国(地区)内部问题会迅速扩散或蔓延到其他国家(地区)。例如在国际经济领域,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随后演变为亚洲地区的金融危机,波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地。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也迅速蔓延到欧洲和亚洲等国,最终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因此,我们需要从跨国(地区)视角来思考全球治理议题,构建行动框架;通过国家(地区)之间的有效沟通来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3. 治理规则弹性化

全球治理的规则是指用于调节国际关系并规范国际秩序的跨国性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秩序。^①治理规则应该是在协调各主体利益基础之上形成的。治理能否得到实施,依赖于治理主体的自愿。全球治理的规则是由全球治理的核心参与者与机构(包括国家和非国家主体)通过行动和协议产生的。^②全球治理的方法包括国家之间的法律协调、国际制度、全球政策问题网络等。但是,也正是由于全球治理规则产生的自愿性,可能会因为国家间的权威关系^③产生治理失灵。因此,全球治理虽产生于治理主体合作的自愿机制,但是只有基于秩序和规则约束的治理才有规避合作失灵或风险的可能。

在2016年G20(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中国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张,为应对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局面,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转型与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前瞻性路径。“治理”“创新”“转型”日渐成为推动全球化,以及各经济体走出周期性波动阴霾,向结构性创新转型的重要关键

① 孔凡伟. 全球治理中的联合国[J]. 新视野, 2007(4): 94-96.

② O'BRIEN R, GOETZ A M, SCHOLTE J A, et al. Contesting global governa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③ LAKE D A. Rightful rules: authority, order, and the foundations of global governance[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0, 54(3): 587-613.

词。中国区域发展成就和区域治理实践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新的视野、方案和道路。



第三节 全球化中的区域化

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加剧演变,地缘政治、国际贸易、知识产权、全球价值链等多个议题交织。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多要素间形成更为复杂、弹性和动态的关联性。工业化进程与科技迭代更加广泛、迅速地重构全球化。全球化中的区域主体更为多元,发展诉求更为多样。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全球化中的区域化更为凸显。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化进程加快以来,科技创新在一国(地区)竞争力塑造上的战略角色日渐突出,很多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创新版图日益凸显。特别是全球化加速、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发展,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崛起这几种力量共同重塑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后,世界创新空间版图出现了向“多中心”和扁平化演化的趋势。例如,美国研发支出总量在全球研发支出中所占份额从 1960 年的 69% 下降到 2017 年的 28%。^① 1992 年到 2020 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专利申请量最多,北美地区次之,欧洲与中亚地区再次。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南亚地区和中东与北非地区的专利申请量较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无专利申请量数据),如图 1-4 所示。很多新兴经济体的城市在全球知识产出版图上开始位居第一梯队,如图 1-5 所示。

二、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2001 年,Gereffi 在“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②概念基础

^① CSR Report. The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history, authorities, issues, and options[R]. 2020.

^② GEREFFI G. The organization of buyer-drive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how US retailers shape overseas production networks[M]//GEREFFI G, KORZENIEWICZ M.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Westport: Praeger, 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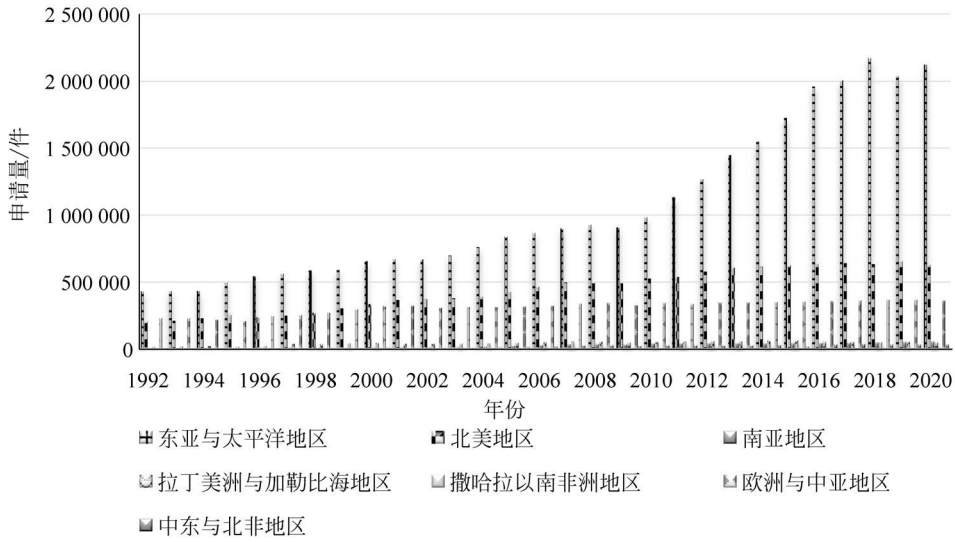


图 1-4 全球各地区专利申请量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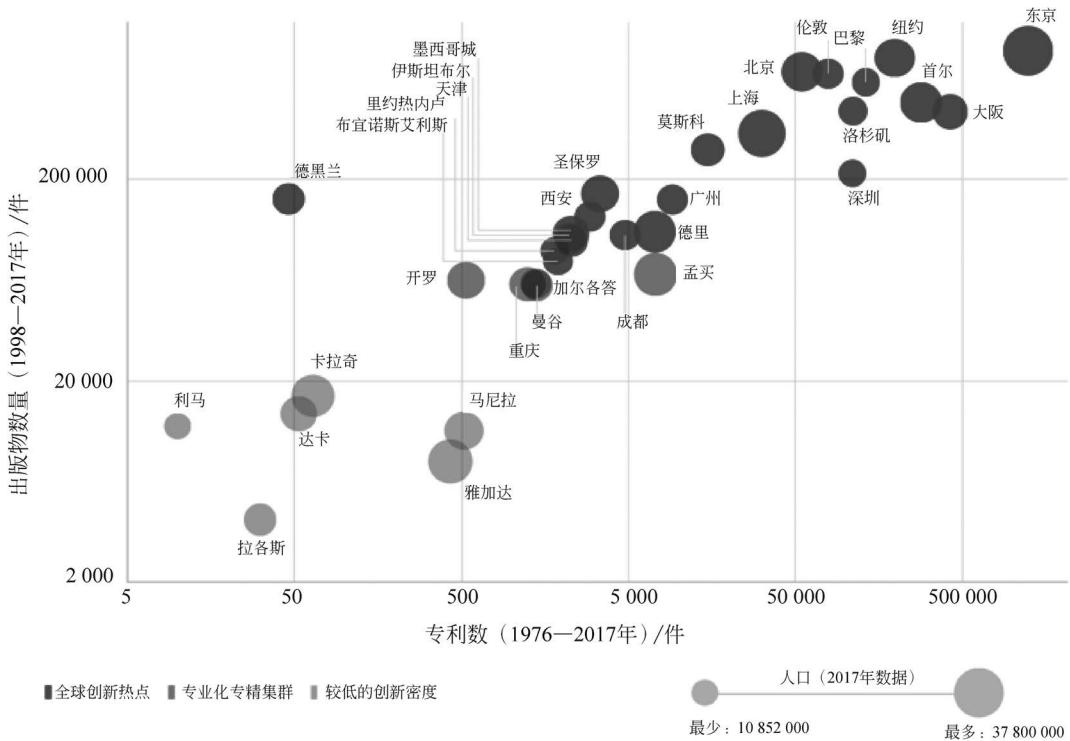


图 1-5 全球知识产出的城市分布

资料来源：WIPO. 世界知识产权报告 2019[R]. 2019.

上,提出了“全球价值链”^①的概念。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将全球价值链定义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产品或服务从概念到生产、最终消费、消费后回收处理的全阶段。^②全球价值链分析有两个视角(全球、本国)、六大维度(投入产出结构、地域范围、管理结构、升级迭代、本国体制、行业利益相关方)。^③

当前,全球价值链与国际贸易、全球产业变迁和各国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程度日益加深。例如新冠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存在明显冲击。在需求与生产端,新冠疫情导致多国医疗设备和药品短缺,需求的激增超过现有生产力,这使得各国更加依赖进口;运输延误、疫情封锁使得复杂价值链中缺少中间产品,从而造成生产中断;政策与疫情的不确定性迫使企业不得不实现供应来源多样化。^④ 在创新端,新冠疫情后,以信息制造和数字服务技术的产业转型以及全球气候变化议题下的低碳发展快速推动着全球价值链从传统贸易、投资和消费领域转向新业态,如无形资产、数字平台以及绿色创新领域迁移。本来,这一转型应该是基于国家、地区间自身要素禀赋、国际分工和发展诉求,并且在社会场景驱动和市场机制下的全球价值链重塑过程。近来,全球价值链受地缘政治影响的程度更深;全球经贸机制和全球治理机制的正面积积极作用受到了抑制。

在国际政治因素介入下,全球价值链正在从聚合型结构向分布式结构转型,增加了国家(地区)间贸易成本和贸易风险。全球价值链本应是多经济体、多市场主体共同参与形成的一种网络结构,可以稀释掉上述原因引致的断链风险。但是,在新冠疫情、极端气候和地缘冲突等因素综合影响下,原材料供应短缺、物流体系不稳定、商品交货时间压力加大以及消费者的恐慌极端式消费行为等问题可能随时出现;也就是说,各种非预期性的策略可能随时出现。上述问题增加了全球价值链运行的交易成本,既有的稳态结构被破坏了。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全球价值链参与大国,却正在解构全球价值链的当前

① GEREFFI G, HUMPHREY J, KAPLINSKY R, et al. Introduction: globalisation, 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J]. IDS bulletin-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1,32(3): 1-8.

② KRAWCZYK Z, UNID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J]. Przemysl chemiczny,2003,82(2): 65-69.

③ FERNANDEZ-STARK K, BAMBER P, GEREFFI G.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Latin America offshore services value chain[M]//BARDHAN A, JAFFEE D, KROLL C. The Oxford handbook of offshoring and global employment[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④ BACCHETTA M, BEKKERS E, PIERMARTINI R, et al. COVID-19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a discussion of arguments on value chain organiz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WTO[R]. WTO Working Papers,2021.



形态并试图建立以自身为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角色。美国签署“美国供应链行政命令”^①,针对半导体、先进电动汽车电池、医药、稀土四类产品供应链之韧性进行百日调查,其最终审查报告以“建立韧性供应链,复兴美国制造,促进广泛成长”为名,分析这几项产业之主要产地及其供货商,以评估风险与对策。美国召开跨国半导体供应链高峰会,要求各国主要从业者将半导体产能移往美国就近供应。欧盟虽在半导体产业拥有全球竞争力的设备制造商,但是缺乏量产芯片的厂商,受制于汽车芯片不足而陷入停工。为应对此项危机,欧盟国家签署了《欧洲处理器及半导体科技倡议联合声明》^②,旨在恢复欧盟之先进芯片设计及半导体产能,建构欧盟的开放性的战略自主。2018年6月,法国与加拿大联合提出“人工智能宣言”^③,呼吁在七国集团框架内建立“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④同年8月,该组织正式成立,成员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等15个国家,重点关注合理使用人工智能、数据管理等四个领域的发展。

近年来,世界地缘政治跌宕,局部军事冲突频发,导致国家间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行遭遇较大阻力。很多国家和地区迫切寻求产业链、供应链本地化策略以建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本地化生产网络安全性。既有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形态面临重构选择。

三、湾区成为新引擎

湾区(bay area)是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版图中的一股新兴力量,它是环绕沿海口岸分布的众多海港和城镇所构成的港口群和城镇群。《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20》显示:全世界近50%的创新集群都产自海岸线城市;全世界60%的经济总量、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也都集中于距海岸100~300千米的海岸带地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被称为全球四

①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EB/OL]. (2021-02-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2/24/executive-order-on-americas-supply-chains/>.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declaration on processors and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EB/OL]. (2020-12-07).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joint-declaration-processors-and-semiconductor-technologies>.

③ Government of Canada. Canada-France statemen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EB/OL]. (2018-06-07).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nternational_relations-relations_internationales/europe/2018-06-07-france_ai-ia_france.aspx?lang=eng.

④ OECD. G7 Hiroshima process 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EB/OL]. <https://doi.org/10.1787/bf3c0c60-en>.

大知名湾区。开放的经济结构、全球价值链高端产业、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化的创新网络是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特征。

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拥有全美约 80%、全球约 60% 的风险资本。东京湾区的 GDP 总量占到全日本国内的 1/3。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土面积为 5.71 万平方千米,分别是纽约湾区的 3.3 倍、旧金山湾区的 3.2 倍、东京湾区的 1.6 倍。我们国家的粤港澳大湾区总人口约为 6 960 万人,是纽约湾区的 3.4 倍、旧金山湾区的 8.9 倍、东京湾区的 1.6 倍。^① 纽约湾区采取“政府+资本”的创新模式,政府提供土地、人才和税收等要素保障为企业营造创新氛围;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又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充足的资本支持;旧金山湾区鼓励高校与企业密切合作,促进技术转移和衍生企业发展;东京湾区成立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负责支持、协调政府与湾区内企业的创新合作事宜,形成“第三方机构+企业”这一创新模式。世界著名湾区的发展路径和趋势特征充分印证全球科技创新是湾区发展的核心属性。^② 全球三个国际湾区在新冠疫情发生初期却显示了区域治理中城市间碎片化的资源分配困境与“治理失灵”的严重问题,对湾区经济活力起到了巨大的抑制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受益于国家宏观政策与区域市场的双重力量,2020 年湾区 GDP 仍超过 1.7 万亿美元,保持了稳定发展态势。可见,湾区虽然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但是湾区经济是否真正有效,最终取决于湾区治理的机制是否有效。

四、地区间合作意愿增强

区域经济合作是跨国(地区)型区域治理安排的一种主要方式。区域经济合作包括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经济制度与历史背景相似的地区之间开展的合作,欧盟即为此类;另一种是成员之间经济水平差距较大,但为实现资源和优势互补或构建更为紧密的依赖关系而开展的垂直合作,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协商一致原则建立的区域协议安排,是在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内部事务和互不侵犯基础上,通过构建丰富性的对话机制,保留各成员自身文化历史特色以及提高应对挑

① 李应博,周斌彦.后疫情时代湾区治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J].中国软科学,2020(S1):223-229.
② 段艳红,何悦,胡品平.世界三大湾区的发展路径与特征[J].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究,2018(4):27-30.



战能力的重要性达成一致的安排和集体行动。^① 排他性的竞争并不是区域治理的应有之义。在现有国际关系结构基础上,秉持相互尊重,彼此关切和需求,构建开放、自主、合作、共赢的区域合作治理新结构才是跨国(地区)型区域治理的内在要求。在国家行为体之间达成的区域协定是国家间开展区域合作、对话沟通和实施区域治理的主要方式,也是国家、地区间府际协议的一种主要形式。

全球经济的有序发展依赖于一整套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和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有效运转。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隶属联合国且独立运行的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5年成立的永久独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这三大支柱奠定了战后恢复发展的治理基石。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区域层面,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涌现。截至2020年8月,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的496个区域贸易协定中,有306个已经生效。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南部非洲关税同盟(SACU)等区域组织在区域和整个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在南北板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声音得到加强。G20在危机后迅速走向前台并升级为首脑峰会,覆盖了全球总人口的2/3以上和全球GDP总量的85%,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成为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平台。此外,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通过加强合作,以寻求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全球治理体系中更大的舞台和话语权。金砖五国(BRICS)合作、“一带一路”(B&R)倡议以及“金砖+”模式正在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参与建设平等、互利、合作的全球治理机制以及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的新力量。

全球化时代的区域治理视角更加普遍多元,对新规则的探讨更加深入,挑战也日渐增加。如何协调日益一体化、高度依赖的全球化发展诉求与国家(地区)自身发展诉求之间的平衡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的重要议题。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使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道路受到了广泛质疑,世界经济的分歧和割裂逐步显性化。西方大国通常以本国既有的全球优越感维持国际话语体系和国际权力结构的主导权。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蓬勃发展,新兴国家(地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

^① FENNELL S. Building on Bandung: what does cooperation do for regional engagement? [J]. Asian journal of peacebuilding, 2022, 10(1): 87-105.

性话语也在对应性地增进,多边经济组织改革中的新兴国家(地区)角色地位日渐提升。世界贸易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区不断转移,东亚经济体凭借劳动力优势,成为生产、贸易、投资的新目的地。随着全球化发展,双边、区域贸易协定纷纷涌现。这一进程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向更有利于中小国家(地区)和新兴国家(地区)发展的方向倾斜。但是,不容忽视另外一个问题——“意大利面条碗”现象(spaghetti bowl phenomenon)。在区域型组织更为多样性的结构中,谈判议题复杂以及参与国家(地区)众多。很多国家(地区)都是多个区域组织或协定安排中的参与者,必须面对多方博弈型的策略集而作出立场选择。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全球化面临的挑战加剧,拉高了全球化运行成本,产生了较大的外溢后果。全球化中的巨大挑战就是世界上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财富差距不断扩大。全球经济增长并不一定能以相同的速度改善全球所有人的福祉。世界上最富有的26个人拥有的财富与世界人口中最贫穷的50%的人拥有的财富相同。^①全球有33亿人(占全球人口的71%)获得的收入低于10 000美元,其中不到80%的收入或财富相当于超过5 000美元。另外,全球只有3 400万人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资源,但最富有的0.7%的人拥有全球任何一年创造的财富的45%以上,2015年为113万亿美元。每年流向已经富裕的人的财富占世界总财富的84.6%。^②发达国家内部财富分配问题导致其国内中低收入群体失业率提高,越来越引起国内民众对财富分配的高度不适感。但是,这些问题被发达国家简单转嫁到国际关系,造成极大的负面外溢后果;全球治理形式面临更大挑战。

经济行为体间的“互嵌性”已成为全球化中的典型特征。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成了彼此嵌套的全球地图上的“马赛克”,区域间经贸关系日益紧密。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区域贸易协定(RTA)成为地区间合作的重要机制;同时各类区域组织也快速发展起来。在区域间合作的制度化建设上,截至2024年1月19日,共有295个区域贸易协定在执行^③,自1948年以来,RTA的新增数

^① LAWSON M, CHAN M K, RHODES F, et al. Public good or private wealth? [EB/OL]. (2019-01-21)[2019-02-25].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public-good-or-private-wealth>.

^② ESTES R J. The ‘rich’ and ‘poor’: the widening income and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nations worldwide[M]//BRULÉ G, SUTER C. Wealth(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series, vol 76. Cham: Springer, 2019.

^③ <http://rtais.wto.org/UI/PublicAllRTAList.aspx>.

量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在 2009 年和 2021 年分别达到了峰值,如图 1-6 所示。欧洲、东亚地区和南美洲加入 RTA 的数量位居全球前三,如图 1-7 所示。目前,在全球发挥治理机制的有代表性的跨国性的区域协定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一带一路”倡议。此外,“金砖+”机制、欧盟、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SCO),二十国集团、非洲同盟、南美洲国家联盟(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USAN)等一些区域组织也在不同程度地发挥全球治理中的参与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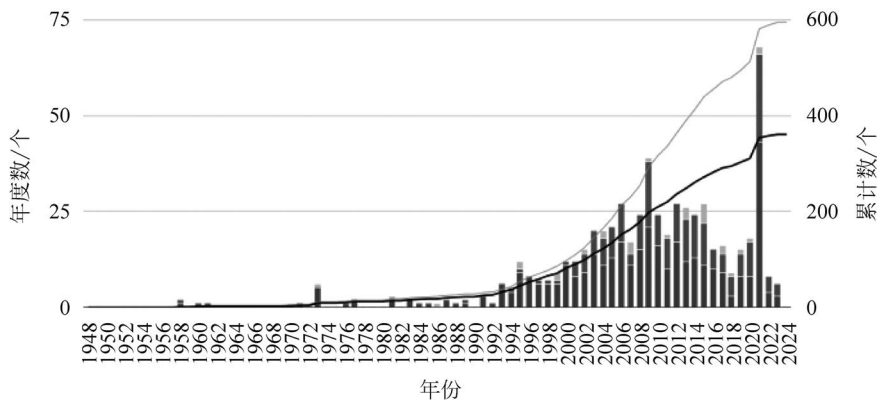


图 1-6 1948—2024 年新增加入 RTA(执行中)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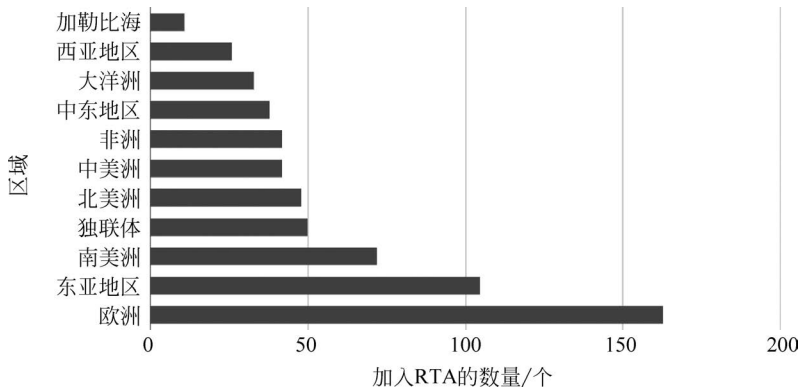


图 1-7 截至 2024 年 3 月世界各大区加入 RTA(执行)的情况

本章小结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主要推动力。全球化的经济效果易被感知,但是全球化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却易被忽略。

今天,世界已进入经济、地缘政治和社会结构加速演变的新阶段。建立地区间合作、包容发展、公平发展、普遍安全的区域治理机制,对增强地区竞争能力、开放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至关重要。面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风险管控艰难的外部挑战,构建区域发展的新机制和新模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区域治理机制,构建持续对话渠道和工作平台;强化风险预警机制,提升区域政策设计水平和治理能力;对全球新型治理体系构建及全球化回归提供重要新思路。

关键术语

全球化 相互依赖 全球治理 区域治理

复习思考题

1. 什么是全球化中的相互依赖?
2. 当前全球化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3.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4. 技术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5. 社会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6. 如何理解全球治理的应然性?
7. 世界范围内的区域化包括哪些主要特点?
8. 近年来全球的区域贸易协定包括哪些类型?